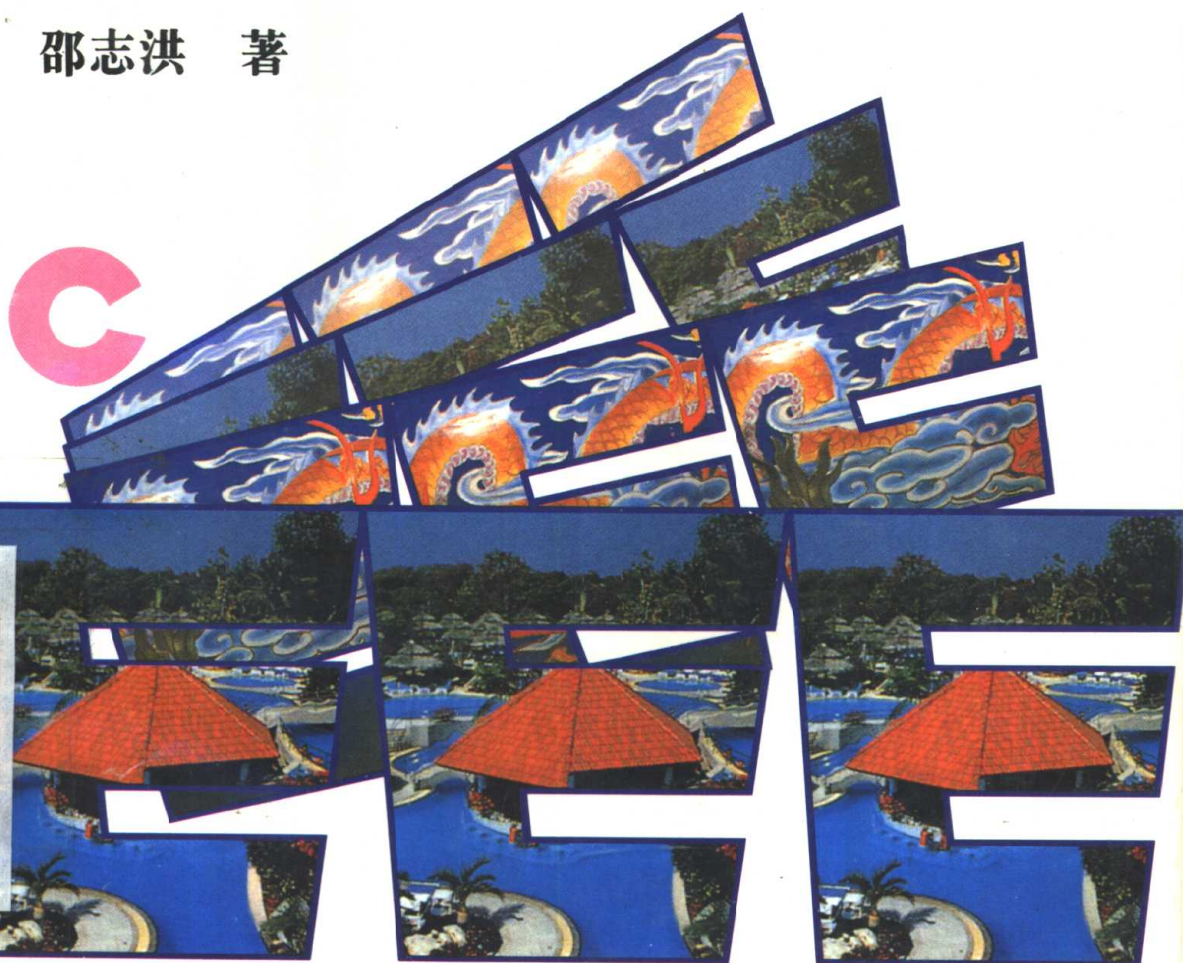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

CONTRASTIVE ENGLISH - CHINESE STUDIES

邵志洪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

邵志洪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8 号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

邵志洪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7 电话 64104306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49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28-0784-1/H·100 定价 20.00 元

序

邵志洪同志最近编著了一本《英汉语研究与对比》，这对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硕士点的建设是一项重要贡献。他寄来了书稿，让我读后写一篇序文。在对比语言学方面我做了一点工作，但大都是皮毛，起不了多大作用，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只可以说我比较热心于这个学科的工作，愿意学习。所以让我作序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这几年我已经注意读他的文章，从发表的论文看，志洪同志的英汉语对比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但主要成果集中在1990年至1996年之间。40余篇一个学科方向的论文大都发表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这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他的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1996年5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他被选为该学会英汉对比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是这个委员会中一名最年轻的委员，他为人学都好，大家都很喜欢他。

看完了书稿，我感到志洪同志的研究既有一定深度又有一定广度，既重视应用研究也重视理论探讨，同时还非常注意方法论的建设。从全书可以看出，他的研究领域是从构词和词的理据开始的，中间有词汇、语义和语法，最后到语用和修辞，涵盖的范围是相当广的。这本书与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和连淑能的《英汉对比研究》两书相比，有些方面有新的深入和发展，比如关于词的理据、词的语义功能、词汇语义容量、语篇分析、会话原则、语用含糊等方面的研究，其领域显然扩大了。从各章节内容看，语言材料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论证也很严谨，而且多处都有他独到的见解，表现出了他研究的深度和颇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如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模糊性，词语搭配中的“同义反复”和“可预示性”，本义和形象意义短语动词，metaphor导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语义变异与语用变异，言外错位和言内错位等等，这些内容都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

志洪同志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微观研究,但他不就事论事,他在每一个问题的研究中都重视理论上的总结。不但从所研究的现象中总结出规律,而且还从宏观上探索形成规律的原因。我个人体会到,在两种语言中找到其异和同并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并非易事,要科学地说明形成这种异和同的原因那就更加困难。这后者是从事英汉对比研究的学人今后应重点进军的方向。

志洪同志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用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英语和汉语并适当加以比较。中国学外语的有些人不大愿意研究汉语,比较喜欢引进外国的东西。引进是必要的,特别是我们没有的,更需要引进,但不应停留在引进的水平上和阶段上,要用引进的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促进我们自己的学科发展或创立新的学科。这才是学习国外语言文化的目的。这种精神在我国外语界应大力提倡。

说到研究方法,我想重申我的一个看法。有的说要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了外语和汉语,才能从事外汉对比研究;要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了语言材料,才能进行语言理论研究。这貌似严格而科学,但实际上却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请问国内外从事语言对比研究的谁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掌握了两种以上的语言?恐怕无人敢说。请问国内外研究语言理论的谁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了语言材料?恐怕也无人敢说。如果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下一步还有什么事可做?科学研究是微观—宏观—微观—宏观……这样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微观研究是基础,宏观研究是导向,二者的关系像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一样,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科学的发展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系统化的,对比语言学与对比文化学也不例外。”(李瑞华,1996:652)

进入90年代以来英汉对比研究在国内有了明显发展,作为一个学科有三个重要问题似乎应该在发展的早期得到解决,这样有利于学科的建设。这三个问题是:学科名称、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当然作为一个学科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解决,比如学科理论

体系、功能、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等,这要在发展中逐步建设。

学科的名称应正式定名为英汉对比语言学,它是双语对比语言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可以单向也可以双向,因此名称就可以有英汉对比语言学、汉英对比语言学或者英汉汉英对比语言学,但学科的性质是一样的。

关于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对比语言学的英文名叫 Contrastive Linguistics,它是 B. L. Whorf 1941 年第一次开始使用的:“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lassify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earth into genetic families, each having descent from a single precursor, and in tracing such developments through time. The result is calle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technology of thought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his plots the outstanding differences among tongues — in grammar, logic, and gener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Pietro, 1978: 10) 可见 Whorf 一开始就强调差别,当然既有语言方面的又有文化方面的。Robert Lado 1957 年在他的专著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的 Preface 中说:“This book presents a fairly new field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namely the comparison of any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discover and describe the problems that the speakers of one of the languages will have in learning the other. The results of such comparisons have proved of fundamental valu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sts, and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ments.”由此可知 Lado 是把对比语言学列在 applied linguistics 的范围之内的,对比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外语学习中的困难和问题,进而为教材、测试以及学习活动作做好准备。Prajapati Sah 认为对比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但有些问题他自己弄不清。Paul Van Buren 和 R. Dirven 认为对比语言学对外语教学无用,但能增强对语言结构的认识,了解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作为一种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以此寻找语言之间的通性。1978 年 P. H. Breiten-

stein 指出对比语言学可分为科学性的和教学性的,前者要求详尽,后者只要求抓住重点。

吕叔湘先生论及英汉对比研究时,重点是从教学角度讲的,比如他的《中国人学英语》和《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是结合中国人学英语和外国人学汉语开展研究的,而且都强调要重点研究两种语言的差异。王宗炎先生 1983 年在《对比分析和语言教学》中指出:“对比分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理论研究,没有其他目的。这种分析应当力求详尽、明白(explicit)、严格,像其他纯理论研究一样。一种是供教学用的,只要抓住重点,加以阐述,不要求细大不捐,系统也不必十分严密。”1985 年赵世开先生在《英汉对比中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中说:“语言对比研究不仅限于教学的目的,它也可以用于语言结构普遍现象(universals)的理论研究,甚至结构分析中方法论的探讨。不过它跟语言教学关系十分密切,一般都把它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1991 年刘宓庆在《外国语》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文中说:“对比语言学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门应用语言学科。我们的理论研究当然应该有对策性。但对比语言学应用研究(翻译、双语教学、词典编纂等等)不应局限于理论研究的视野。”许余龙(1992: 4)在《对比语言学概论》中为对比语言学下了一个定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

从上述国内外专家的论述来看,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重点研究两种语言的“异”,还是重点研究两种语言的“同”,还是二者并重?另一个是对比语言学只搞应用研究,还是应用和理论研究都要搞?我认为对比语言学应该既研究两种语言的“异”也研究两种语言的“同”,异与同应是并重的,不应只偏向其中一个方面。对比语言学虽然从教学应用中产生,但 50 年的发展已有了应用和理论两个方面的研究,显然它已兼有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两个方面的研究任务,因此其学科性质也有了双重性。鉴于这个认识,1994

年在长沙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为对比语言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它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特征，其任务主要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共时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所对比语言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域。”（刘重德，1994：14-15）这个定义具有三个特点：（1）强调了它兼有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两重性，而不是单纯属于应用语言学；（2）强调了不但要描述异和同，还要解释异和同；（3）异和同并重，而不是以异为研究重点。我想明确了学科的性质对学科建设会有好处。我们既研究“异”也研究“同”，既从事应用研究也从事理论研究，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从目前来看，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也比较明确了：它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下属比较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同它并列的三级学科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

赵元任先生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不重视理论研究，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突出弱点。在研究中我们喜欢寓虚于实，但不善于理论假设，我们可否将二者在对比研究中结合起来，从方法论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愿年轻的志洪同志在此基础上继续攀登，在探索这条新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自俭

1997年4月6日

于青岛海洋大学

冷热斋

内 容 简 介

本书根据作者在语言学、英汉语言与对比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整理成章。其中有些成果已以论文形式在国内主要外语学刊上发表。

全书共分四章,涉及语言研究中主要的八个层面,每章各分四节。第一章:构词与理据,第二章:词汇与语义,第三章:搭配与语篇,第四章:修辞与语用。

本书学术性强,可读性强。观点新,内容新。文中语料大多出自近期书刊或名家名著。各章节论述深入浅出,有独到见解。本书重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既有理论指导作用,又有使用价值。提供了语言研究与双语比较的选题方向和研究方法。

本书适合作英语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英语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自学和撰写论文参考用书,或高校专业英语教师、英汉语言与语言学研究工作者、英汉翻译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目 录

第一章 构词与理据	(1)
1.1 转化构词	(6)
1.1.1 N→V Conversion 发展趋势	(6)
1.1.2 “评价性语义特征”的作用	(16)
1.1.3 英汉特指动词缺项弥补比较	(24)
1.2 派生构词	(31)
1.2.1 新词缀的使用	(31)
1.3 合成构词	(40)
1.3.1 多成分复合形容词构词法	(40)
1.3.2 句子型复合形容词构词法	(46)
1.3.3 英汉合词法比较	(52)
1.4 词的理据	(57)
1.4.1 似是而非的“理据”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57)
1.4.2 模糊理据在英语类比构词法中的运用	(64)
1.4.3 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模糊性	(70)
第二章 词汇与语义	(78)
2.1 功能语义	(83)
2.1.1 Utility Words	(83)
2.1.2 Loaded Words	(88)
2.1.3 Slanted Words	(92)
2.1.4 Vogue Words	(96)
2.1.5 Nonce Words	(104)
2.1.6 Up-Scale Names	(113)
2.2 词的涵义	(117)
2.2.1 Love 的象征性涵义	(117)
2.3 词义演变	(127)
2.3.1 National Slurs 的形成与使用	(127)

2.3.2	英语男、女性对应表达方法的语义差别·····	(132)
2.3.3	英语词义变化的主流·····	(138)
2.4	英汉比较·····	(146)
2.4.1	英汉颜色词使用的比较·····	(146)
2.4.2	英汉词汇语义容量比较·····	(153)
2.4.3	英语新词对汉语词语的影响·····	(162)
第三章	搭配与篇章·····	(172)
3.1	惯用搭配·····	(178)
3.1.1	“hardly... when...”结构时态选择·····	(178)
3.1.2	know 的否定式特殊结构·····	(184)
3.1.3	of great “pith” 还是“pitch”·····	(188)
3.1.4	英汉 NP 中的逻辑思维顺序比较·····	(193)
3.1.5	Phrasal Verbs 在汉语中的对应比较·····	(201)
3.2	修辞搭配·····	(208)
3.2.1	英汉词语搭配中的“同义反复”比较·····	(208)
3.2.2	英汉词语搭配中的“可预示性”比较·····	(216)
3.3	语篇分析·····	(223)
3.3.1	诗歌:Language Choices and the General Idea of an English Poem·····	(223)
3.3.2	小说:Artistic Principles Underlying Ellison's Choice of Language·····	(229)
3.3.3	会话:Romeo 与 Juliet 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对话 比较·····	(237)
3.4	翻译评析·····	(246)
3.4.1	诗歌:上下文与诗歌翻译·····	(246)
3.4.2	小说:从心所欲 不逾矩·····	(250)
第四章	修辞与语用·····	(256)
4.1	修辞手段·····	(264)
4.1.1	Analogy 的修辞效果·····	(264)
4.1.2	Simile 使用与英汉审美价值取向·····	(271)

4.1.3	Metaphor	(280)
4.1.3.1	Metaphor 与语义和语用之关系	(280)
4.1.3.2	Metaphor 导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287)
4.1.4	Euphemism	(298)
4.1.4.1	当代英语常用词 Euphemism	(298)
4.1.4.2	Euphemism 导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305)
4.1.5	Zeugma: 语法范畴与修辞范畴	(313)
4.1.6	Quotation 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321)
4.2	语境因素	(329)
4.2.1	“突出”和“背景”	(329)
4.2.2	语义变异与语用变异	(336)
4.2.3	言内错位与言外错位	(347)
4.2.4	冗余现象的积极作用	(352)
4.3	会话原则	(362)
4.3.1	合作原则: 从 Hamlet 与 Polonius 的对话谈起	(362)
4.3.2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从 King Lear 与三个女 儿的对话谈起	(368)
4.4	语用含糊	(377)
4.4.1	语用含糊: 从 Romeo 与 Juliet 之悲剧谈起	(377)
4.4.2	跨文化交际中的元信息混淆	(384)
	参考书目	(396)

第一章 构词与理据

英语主要有三种构词法：(1) 转化(Conversion)；(2) 派生(Derivation)；(3) 合成(Compounding)。

转化法(Conversion)被认为是英语中一个特别能产的构词法，似乎不管是什么结构形式的词，也不管是什么词类的词，都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Bauer, 1983 : 226)。然而，大多数介绍汉语构词法的著作却从来不把转化法列为汉语的一种构词方法。原因是英语中的转化是指词类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否应被称为零派生，在语言学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Bauer, 1983 : § 2.14)。而汉语是一种孤立语型语言，词的语法功能并不依赖于词尾变化形式，因而汉语中的许多词是兼类的，谈不上转化不转化(许余龙, 1992 : 130)。可以说，英语的转类词与汉语的兼类词相当。虽然名称有别，其性质是一样的(喻云根, 1994 : 91)。

N→V Conversion 是当代英语中的一大特色。研究 N→V Conversion 的发展新趋势，制约 N→V Conversion 的因素等问题，都能形成对英汉动词系统比较的一些思考。Quirk 等(1973 : 1012)在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归纳总结了 N→V Conversion 的七种类型，该总结可以说是对到 70 年代初为止的当代英语中 N→V Conversion 的比较系统的描述。在 80 年代里，由 N→V Conversion 创造新词的趋势有增无减。本章中 N→V Conversion 发展趋势(1.1.1)讨论了一些 80 年代出现的实例，通过比较研究表明，N→V Conversion 有发展的新趋势，突出表现在三种转化类型的增多：1. “N→Vi”型；2. “N(泛指)→V(特指)”型；3. “N→V (a duplicate of an established verb)”型。制约 N→V Conversion 的因素有许多，“评价性语义特征”的作用(1.1.2)揭示了词的“评价性语义特征”(Evaluative Feature)在 N→V Conver-

sion 中的作用。

语言中普遍存在词汇缺项 (lexical gap), 特指的名词在数量上通常远远多于特指的动词。那么, 英汉对于特指动词的缺项是如何进行弥补的呢? 英汉弥补特指动词缺项方法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又会产生哪些障碍呢? 英汉特指动词缺项弥补比较(1. 1. 3)研究了以上这两个问题。英汉语言中一些特指动词的缺项通常可以通过“泛指动词(等成分)+特指名词”来表示。由于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结合法”构词模式, 英语 $N \rightarrow V$ Conversion 作为弥补英语特指动词缺项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 可使我们以更简洁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造成某种障碍。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语言转化过程的障碍; 语言文化因素的障碍。

派生法 (Derivation) 通过给词根加词缀而构成新的词。派生法也是英语中一种特别能产的构词法, 有时一个词根可加几个词缀。难怪美国读者文摘社出版的《如何扩大你的词汇能力》(*How to Increase Your Word Power*) 一书把词根、前缀、后缀称为“扩大词汇的三把钥匙”, 而其中前缀和后缀的数量尤其少, 使用的场合却特别多 (汪榕培, 1983: 8—9)。汉语的词缀数量有限, 这一系数比较封闭 (closed), 较难产生新词。除名词、动词、形容词有少量词缀, 大多数词没有形态标志 (喻云根, 1994: 87)。由于英汉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可比性不强。值得注意的是, 汉语的词缀比较封闭 (closed), 而英语的词缀却比较开放 (open), 随着社会发展, 一些新的词缀便应运而生。新词缀的使用 (1. 2. 1) 列举了 80 年代英语中使用的一些新词缀, 讨论了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在这些新词缀中的映射。

合词法 (Compounding) 是在某些语言里出现, 而在另一些语言里不出现的一种构词过程。例如, 日耳曼语 (其中包括英语) 和汉语中, 合词法用得比较多, 而罗曼语 (例如: 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 却并非如此。在整个英语发展过程中, 合词法在构词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为英语增添和补充了大量词语。合词法至今

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英语中不少新词和新语都是借助于原来的词组合成的。

现代英语句法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移向前位 (syntactic switch to front position) 的趋向。Simeon Potter 在 *Changing English* 一书中也指出,前置定语替代后置定语的现象比较普遍。结构上移向前位的倾向充分体现在复合形容词构成上(陆国强,1983:38)。复合形容词使后置修饰语移向前位,调整了修饰语与被修饰语之间逻辑思维的顺序,使修饰语在语序上与汉语形成一致,这种变化趋向也就尤其值得研究与比较了。一般语法书上谈到的复合形容词的构词法,大多指的是两个成分构成的复合形容词的构词法。多成分复合形容词构词法(1.3.1)与句子型复合形容词构词法(1.3.2)讨论的是由两个以上成分构成的复合形容词的构词规律及其使用。

复合词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词类来分,复合词有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等几种类型。按内部结构来分,复合词可以有名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动词等几种形式。按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来分,复合词有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等几种主要类型。按构成成分的自由度来分,复合词的形式有自由词根+自由词根(如“火车”)、自由词根+粘着词根(如“飞机”)、粘着词根+自由词根(如“棉饼”)、粘着词根+粘着词根(如“驱逐”)等四类(Y. R. Chao, 1968:361)。复合词的对比可以以某一种分类方法为基础,比较两种语言中的复合词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点(许余龙,1992:132)。

汉语词组内部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主谓、述谓、述补、偏正、联合等五种基本结构关系,实际上就是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同时也是复合词的内部结构的镜像。这种复合词、词组、句子构造上的同一性是汉语组合关系中所独有的,突出反映了汉语以词组为中心的特征。英语则不然,句子在句法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句子无主语则不成其为句子,词组与句子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丁金国,1996)。汉语复合词、词组、句子构造上具有同一性,都重“意合”。英语复合词“在语义上脱离了普通的句法结构”(Quirk,

1973 : 1020), 其组合“不受英语句法在词序排列上的限制”(陆国强, 1983 : 36), 而外部形态上的标志, 如屈折变化和虚词等语法手段往往又不充分。英语复合词的构成通常在提高词化程度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的同时, 削弱了“形合”的作用。英汉合词法在这方面也因此而增加了可比性。英汉合词法比较 (1. 3. 3) 是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的。

词的理据 (motivation) 指的是事物和现象获得名称的依据, 说明词义与事物或现象的命名之间的关系。Ullmann (1962) 认为, 词的理据性主要有三类: (1) 语音理据, (2) 形态理据, (3) 词义理据。英汉词语理据性在历史上都经历了很大的变迁。李冬 (1988) 在《汉英词语理据比较》一文中指出: 在英语词汇体系中简单词所占比例并不很大, 但它们是基本词汇的主体。作为日耳曼语族的一员, 英语似应与德语一样以复合法为其主要构词方法。在古英语时期, 情况就是这样。据统计, 在史诗 Beowulf (贝奥武尔夫) 的三千行诗句中, 使用 1069 个复合词。但进入中古英语时期后, 由于受法语的巨大影响, 英语改变了运用复合法作为创造新词的主要手段, 而代之以直接借用外来词语——特别是拉丁语系的词语。英语虽在渊源上属于日耳曼语系, 但其词汇体系又与拉丁语系有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 英语词语的理据性与同一语系的德语差异甚大, 而与法语接近。汉语词语理据性在历史上也曾有很大的变迁。在古汉语 (至少是其书面语——文言文) 中, 大多数词是单音节词, 即只能是由一个语素充当, 形成大量“语素一字一词”三位一体的现象。因此, 古汉语词语绝少理据。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 (F. de Saussure) 把汉语作为最典型的词语无理据的“词汇语言” (lexical language), 与“语法语言” (grammatical language) 相对, 他所指的其实是古汉语。现代汉语的情况大不相同。随着白话文的推广, 现代汉语词语从单音节词嬗变为多音节词——主要是双音节词, 即所谓“双音化”倾向。派生词 (又称“形态构词”) 和复合词 (又称“句法构词”) 大量出现, 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占有主要地位, 汉语的理据性也随之增大了。汪榕培 (1983 : 18) 提到过现代英语中复合法的

兴起：“复合法是英语中最古老的构词方法之一，复合词是古英语词汇的一大特色。在中古英语时期，由于受法语影响，复合法用得不多。但到十六世纪以后，这个古老的构词方法又渐渐兴起。目前，复合词（尤其是复合名词）在英语词汇中与日俱增。巴恩哈特（C. L. Barnhart）在《英语新词语词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New English Since 1963*）中汇集新词约六千条，其中九百个左右是复合名词，大约占15%”。因此可以说，现代英语中随着复合法的逐渐兴起，英语的理据性也随之增大了。许余龙（1992：140）认为：至于汉语是否像 Saussure 所说的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形态理据的“词汇逻辑语言”，这还需要通过对比来证明。有一些似乎可以肯定，即当代汉语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汉语比较，有较高的理据性，这与许多新兴词缀的运用和大量新的复合词的产生是分不开的。不过，由于汉语中的词缀要比英语少，英语中某些成对的派生词所表达的意义在汉语中要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使汉语在这方面的理据性要比英语弱些。例如，英语中可以用前缀 un- 和 dis- 来表示逆反方向的动作，而汉语中却没有相应的前缀：appear（出现）—— disappear（消失）；assemble（装配）—— disassemble（拆卸）。许国璋（1991：32）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时指出：“文明社会时期创造的新词新语，就不再是任意的了，而是立意（motivated）的了，甚至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了。因此可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有任意的，部落社会时期是约定俗成的，文明社会时期是立意的。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英语中的新词通常都是立意的，是有理可据的。从历时角度看：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词的理据可能丧失或者变得模糊。在现代英语中有些词变成无理据（non-motivation）或者难以找出理据（陆国强，1983：73）。从共时角度看，我们认为：词的理据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时也会变得模糊。

本章中似是而非的“理据”形成原因及其影响（1.4.1）指出：语义变化以及词的形义之间关系的任意性是引起有些词的似是而非